

# 制度主义组织研究中的行动者

## ——一种梳理制度主义组织理论的可能

阿拉坦<sup>1</sup> 屈博<sup>2</sup>

(1.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2. 内蒙古自治区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行动者之间合作制度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构成了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的研究中蕴含的一个重要理论议题。该学派分析了社会行动者共享的社会文化和组织成员利益多元化两个方向突围代表理性化“铁笼”困境的组织科层化问题。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在承接、发展了老制度主义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分析,描画了多个组织构成的组织场域中的社会文化因素,行动者不再处于显著的理论位置。经济学的制度主义以行动者利益的分析思路搭建其组织分析框架,但将老制度主义的分析传统中的基于社会情境的中利益关系转化为了市场交易情境的利益关系。将制度视为社会符号系统是社会学组织重新将社会行动者置于研究的核心地位的可能的选择。

**关键词:** 组织研究; 制度主义学派; 行动者

**分类号:** D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14)04-0038-07

组织分析的制度主义研究是组织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富有特色和影响力的取向。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都被归入这一研究脉络之中,被称为“组织研究的制度主义学派”。这一学派通过研究组织制度来解释包括科层制、组织边界、规模及组织变迁、趋同等在内的一系列组织现象。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其研究对象也从企业、政府到非盈利性机构等各有不同。这些研究对我们如何认识组织、制度及社会都富有启发意义。但也正是因为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类别众多的研究主题”和“各有特色的结论”这些复杂的特点,使得当我们试图将这些研究放置在一个流派——“制度主义”的脉络之中时面临着一种整体把握的困难。

正是这种困难的存在使得我们对制度主义理论的梳理成为必要。目前在国内外,已有部分学者撰文对这一流派进行总结和反思。在这些讨论中,大家普遍采用一种对这一流派学科式的大区分框架:经济学的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主义和

社会学的制度主义,或对某些学科内部的制度研究进行“新”、“老”制度主义的区分。这些分类方式为我们理解该学派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框架,对经验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目前的梳理工作,或是仅对某一学科内部该学派的研究议题变化进行评述<sup>[1]</sup>,或是倾向于关注不同的学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制度主义研究之间的区别<sup>[2]</sup>。但从“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进行的研究,仍不足以让我们对该学派的研究脉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当然,所谓“整体把握”或“理顺研究脉络”并非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也非本文所能企及。本文所要做的是,希望提供一种串联制度主义研究部分流派的视角,并探讨这个视角可能带来的理论资源,以期达到更为整体、系统的认识提供一种可能的视角。笔者以组织研究的制度主义学派出现伊始就试图解决的任务为出发点,提供一种从社会学研究传统中理解各分支学派的可能。具体来说就是以制度主义社会学早期发展中蕴含

收稿日期: 2013-12-12

作者简介: 阿拉坦,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屈博,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自治区党校政治学教研部,讲师。

的两种行动者视角,分别来看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和经济学如何讨论制度问题。

## 一、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 走出“铁笼”

在组织研究层面,马克思·韦伯有关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诊断突出表现为他有关“科层制”的讨论。他提出,随着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科层化带来了对效率、效益的普遍关注。它使得现代社会中的组织越来越倾向于将组织中的个体以一种功能化、机械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使得个体的价值诉求逐渐淡出其社会行动之中。<sup>[3]</sup>在这种社会组织制度中,个人的个性、信仰等价值关联的因素被排除在组织生活之外,每个个体都被平整化了,成为追求效率的组织机器上的零件。如果说理性化已经抛弃了与其价值关联的源头,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自我驱动的动力——一个“囚禁个体人性的铁笼”<sup>[4]</sup>。科层制正是这种理性“铁笼”在社会组织层面上的表现。

韦伯有关组织科层制研究中所展示的现代社会中“理性大获全胜”组织图景,构成了后人研究组织时不得不面临的理论命题。正如P·迪马吉奥和W·鲍威尔所说“韦伯的铁笼比喻一直困扰(haunted)社会学家。”<sup>[4]</sup>富有悲观色彩的“铁笼”形象构成了早期制度主义研究者讨论组织问题时不得不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如何走出“铁笼”构成了他们社会学研究背后的主要动力。<sup>[5]</sup>

正是在这种理论诉求的驱动下,以默顿学派的塞尔兹尼克、古尔德纳等人为代表的老制度主义社会学学派的学者展开了他们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他们从自己的经验研究中汲取资源,寻求构建一种不同于韦伯笔下科层制的组织形象。他们的努力正是从组织中行动者多面的形象开始的。从处理组织中行动者的方式来看,他们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即组织科层制制度目标的实现因为组织中利益的多元而遭遇挫折和科层制制度面临组织内外社会文化力量的挑战。

塞尔兹尼克有关田纳西河流域的水利工程基层结构的研究正是属于第一个方向的研究。该研究已经由很多有关制度主义学派的讨论作为老制

度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典范。<sup>[1]</sup>田纳西河流域的水利工程作为一个国会立法通过的项目,旨在水利上控制水患的同时又为当地农业和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上的便利。该项目有明确的组织机构、组织目标及科层化理性的实施运作的设计。但是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组织中出现了各方利益的分化,导致项目未能达到水利工程的良好效果,也未能对当地农民带来良好的扶贫效应。<sup>[6]</sup>

在对塞尔兹尼克这个研究的评述方面,以往的评论集中在他展现的组织与其外部环境(TVA与其相关的各种国家机构、地方组织)之间的关联,以说明导致组织目标失败的原因。从行动者角度来看,塞尔兹尼克向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组织内部因利益群体分化的视角。从而,制度中的行动者不再是韦伯理论中呈现的那种个体化的、服从于科层制制度理性的行动者形象。个体从一个作为科层化制度下理性技术组织中走了出来,聚合为一种部门群体(农业部、农村组织及田纳西当地政府机构)的利益行动者。或许我们可以说,通过行动者利益,塞尔兹尼克让组织走出了科层制的技术、效率的控制;通过行动者利益引入来自组织环境中的制度化力量。

布劳和古尔德纳的研究则沿着第二个方向来讨论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布劳在《科层制的动力》(*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一书中通过对比州立就业机构(state employment agency)和联邦法律执行机构(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y)两个行政机构的科层制实际运作情况的研究,揭示了科层制得以施行与组织中的人际关系(竞争、团结等)因素有紧密联系。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竞争、互动模式及价值观念都可能对科层制组织的效率带来正功能或负功能。<sup>[5]</sup>布劳的研究认为,科层制的动力来源并不是这个制度自身理所当然具有的。科层制的实施能否达到其效率、控制的目标取决于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实际状况。

韦伯有关科层制的研究是基于行政机构建立的理想类型概念。塞尔兹尼克和布劳的有关公共部门机构的研究正是试图从行政机构内部的社会现实出发,展现与此种理想类型之间的龃龉之处。而古尔德纳的《工业科层制的模式》(*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一书的研究将制度主义研究的对象转向了企业组织。通过介绍一家石膏工

厂推行科层制中遇到的种种困境,古尔德纳展现了科层制的效率、规范准则受到的来自组织环境(社区共同体)文化和工作中形成的劳动关系双方面的抵制。在考察了管理层和工厂工人对科层规章的不同态度和行动之后,古尔德纳总结了三种科层制的现实模式:嘲讽或名存实亡(mock)模式、表征(representative)模式和惩罚中心制(punishment centered)模式。<sup>[7]</sup>

较之塞尔兹尼克强调群体利益的研究,布劳和古尔德纳则通过各自的经验研究突出了组织行动者的社会文化属性和这种属性带来的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力量。两人的研究中,作为行动者的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团结程度、共享价值观念及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对抗与合作都构成了影响科层制实际运作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呈现的两个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出,塞尔兹尼克从组织内部行动者的群体利益出发展现了科层制运作过程中遭遇的挫折,而布劳和古尔德纳从行动者所受到的价值、组织内部人际关系来讨论对同一过程的影响。这两种研究表现的是老制度主义社会学试图走出韦伯的科层制铁笼的两种理论可能。而这两种可能的共同点在于,都是通过具体组织内部的行动者找到科层制运作过程中非技术、效率原则的行动基础。即找到行动者遵循的不同于科层制技术、程序和效率合法性之外的合法性基础。而两种处理方式的不同也正是这种合法性基础的不同:塞尔兹尼克研究中的行动者遵循着利益的合法性原则,而布劳、古尔德纳研究中的行动者则遵循着社会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原则。

虽然老制度主义社会学在一定意义上只是提供一种与组织科层化现象相悖或科层化表象下面复杂的现实社会过程,是一种拆解组织“铁笼”形象的努力。但同时,通过老制度主义社会学视角对组织行动者的分析,其本身蕴含着一个基于行动者视角的对制度的理解——即借助行动者自身的行动原则“走出铁笼”的研究诉求。如果组织本身就是一种表现行动者之间合作的结果,那么“制度”则表现的是,行动者之间实现这种合作结果的一种可能方式。要讨论作为合作结果的组织的各种现象,就要讨论这种结果形成的可能方式,科层制只不过是众多可能中的一个,老制度主义

社会学研究正是希望借助行动者视角的分析,在走出铁笼的同时,也找到其他组织制度的可能。所以,制度主义通过对制度因素的关注来解释组织现象,可以转换为“行动者之间如何形成某种合作制度”的问题。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所展现的作为理想类型的科层制与组织现实之间的不吻合之处,对上述这个问题指出了两个可能的研究方向。前述着重介绍两个研究思路——利益的和社会文化的,在“走出铁笼”的意涵之外,又是重新通过制度来理解组织现象的可能出发点。从行动者在理论构建中的角色来看,“制度主义组织”分析学派后起的两个重要方向——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研究——都与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思路的两个方向有关联。

## 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淹没在社会文化之中

新制度社会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组织研究领域的出现成为制度主义组织研究的一种新趋势。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对组织的制度趋同现象提供可能的解释。<sup>[1-2]</sup>新制度主义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方式主要可以总结为两点:1.对制度趋同现象的研究是将组织放置在一个与组织相关的特定场域(field)内,一般将这个场域内的组织个体作为研究单位,而非组织内部的行动者。2.关注对场域内组织制度产生外在影响的力量及使这种力量起作用的机制。

正是在第二个方面,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承接了老制度主义研究的强调社会文化力量对社会的研究思路。不过,学界此时对制度研究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讨论组织如何走出科层制“牢笼”的问题,而是寻找塑造组织制度的力量及方式。但同时,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的“场域”视角来看,他们更倾向于从组织之外寻找,以那些与国家、意识形态或共享观念作为这种力量的来源。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与其前辈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区别。

在理论研究方面,J·梅耶和B·罗恩发表于1977年的文章被视为新制度主义的开山之作。他们认为,组织中那些并不符合组织效率、生产需

要的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具有合理性,是因为这种制度规则的正式结构具有一种组织制度神话和仪式的功能。这种具有神话地位的正式结构,与组织的现实活动没有关系,甚至还会起到一种干扰作用,所以它与组织的实际运作呈现一种“松散的联结”关系。而这种组织制度神话并不代表组织的非理性特色,它代表一种为“社会承认的理性要素”,这对组织生存与组织高效运行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sup>[8]</sup>因此,我们可以说,梅耶和罗恩为古尔德纳所说的嘲讽模式的组织制度的存在提供了一种社会性的基础。

在另一篇几乎具有相似地位的文章中,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则为这种外在力量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来源。与老制度主义社会学家对科层制的禁锢问题深感紧迫不同,迪马吉奥和鲍威尔的《重访铁笼:在组织领域的制度趋同性和集体理性》一文致力于揭示现代社会中源于组织之外的影响力量:(某一群体共享的)意识形态、国家权力和资本(的集中)。他们认为,这些力量通过强制、模仿和规范机制作用于具体场域中的组织。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同样强调一种社会文化的作用过程:(国家权力保障的)相关法律条文制约下的组织、一种共享的职业文化价值的组织及在集中资本控制下的组织都通过上述组织走向制度趋同。<sup>[4]</sup>

在经验研究方面,迪马吉奥将自己的制度理论视角投射在艺术博物馆行业制度场域的形成过程中。迪马吉奥关注的是回顾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艺术博物馆经营理念的重大转变——从面向精英阶层的珍品收藏理念转向面向普通大众的教育理念的历史。他通过讨论两个关键机构——“卡纳基基金会”和“美国博物馆协会”在这一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行业协会的共享价值观念和基金会代表的资本力量对组织制度的影响。<sup>[9]</sup>P·赫希的另一项研究关注美国商业社会中企业之间兼并收购过程中使用的形容语言。借此他向大家展示了这种兼并制度如何通过将语言的负面描述(伏击、熊抱、黑色骑士等)转化为正面描述(降落伞、谈恋爱、结婚等)而获得制度合法性。而该现象的出现源于一种社会大众语言认知。P·赫希的研究关注的“语言和心理机制”,补充了迪马吉奥讨论的趋同机制。<sup>[10]</sup>

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关注外在于组织的力量对场域内众多组织的制度上的特点影响。这一特点也为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提供了产出丰富的理论土壤。而这些定量研究将影响组织制度的社会因素以数量化分析的方式展现出来。如M·马丁和W·斯科特展现了政府或是行业协会对医院制度(管理、技术)的合法性影响<sup>[11]</sup>,而D·索恩讨论了美国的会计制度的改革如何导致了美国企业中首席财务官(CFO)职位的出现和流行。<sup>[12]</sup>在定量研究中我们往往可以更多地看到迪马吉奥提出的政府权力对组织制度带来的影响。

无论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分析与老制度主义社会学之间的既承接又背离的关系。一方面,这些研究突出强调组织受到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社会文化因素与具体的行动者相分离。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意识形态,甚至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都成为决定组织制度的重要因素。而组织内外的个体行动者淹没在种种结构性力量之中。也许这种批评可以被认为是没能把握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关键而显得不公平。因为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在解释组织趋同现象的之外,他们试图描绘对当今组织所处的社会背景中强大的社会力量及这些力量所代表社会发展趋势。这正是新制度主义研究富有意义的优点所在。

但这仍不能解决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困境,他们的研究,常常对组织制度形成和变化的问题难以给出很好的解释。因为从行动者角度来看,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中的行动者成为权力结构、共享意识形态、资本等关系决定的个体。这种决定局面下,组织制度的形成和变化的问题自然成为一个难题。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在承接老制度主义的社会文化研究传统的同时,却放弃了其行动者的视角。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中行动者的消失,意味着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中阐发出来的“制度作为一种行动者合作可能方式”这一重要研究取向的消失。

在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中,解放“铁笼”困境的理论资源——社会文化的力量,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中成为将行动者淹没的力量。这种将行动者策略性地省略的做法背后自然可能有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追寻塑造组织制度的强大社

会力量诉求。但是当我们需要探讨“如何从这种趋势中重新找到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制度新可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将“对行动者的忽视”视为以一种可接受的损失。

### 三、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交易制度中的行动者

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将交易作为分析单位,讨论制度为何会存在的问题。这种分析思路得益于市场中存在的交易成本、投机行为和行动者有限理性等理论问题的发现。

科斯最早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研究带入有关组织的讨论中,其有关企业组织的研究甚至要早于社会学老制度主义研究。科斯的研究中关注这样的问题:企业组织得以建立的原因何在?他通过劳动力市场视角将企业 and 市场作为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制度。科斯的研究基于他对市场交易制度中存在的“交易成本”的重视,这种交易成本是古典经济学在讨论市场行为时并未考虑到的。但科斯提醒学界,“交易成本”确实存在,且影响着参与市场交易的行动者。之所以有企业组织的存在,是因为企业主可以通过雇佣劳动力的方式“内化”市场交易中的成本。由此,企业组织就作为一种代替的市场交易的新制度形式出现。<sup>[13]</sup>换句话说,行动者之间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合作必然存在的成本问题,正是企业组织出现的原因。企业组织提供了另外一种实现合作的交易制度。不过,科斯的理论虽然解释了组织的出现,但是不能解释组织中内化的交易制度的不同形态。

威廉姆森认为,不论是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部,劳动雇佣本质上都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中的个体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行动者投机行为和行动的有限理性。契约中行动者在威廉姆森看来都是有着“损人利己”的倾向,并且契约双方对交易过程很多因素难以完全“理性”地认识清楚。正是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交易的成本问题成为具体交易中的行动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为了达成交易并使得参与交易的行动者有保障,就需要针对交易(在产权、确定程度以及频率)不同性质方面的问题有不同的制度来规

范。<sup>[1]</sup>威廉姆森的理论丰富了科斯有关制度的解释:从为什么需要企业制度到在什么条件下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威廉姆森的理论也有着更为明确的行动者假设:天然的投机倾向和有限理性的特点。

从科斯和威廉姆森的研究所代表的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来看,该流派从经济学“交易成本”角度出发提供了一种解释制度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这种思路可以通过考虑行动者利益保障或减少成本的需求来讨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不同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该流派的研究特点是从行动者的利益着手构建对组织制度的解释。

通过将“交易”作为研究单位,经济学的制度主义研究,回答了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中通过利益行动者找到行动者之间合作制度可能的问题。只是这种利益视角,是一种从抽象的“契约”关系中推导出来的利益,而不是老制度主义社会学所关注的具体社会关系情境中的利益。所以说,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研究从自己对行动者假设出发,将“行动者之间合作可能”问题,转化为一种“行动者之间合作需求”的问题,并做出了一个具有自己学科特点的解释。

### 四、结论、讨论与不足

老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组织研究,借助行动者遵循的利益或社会文化的原则,找到了两种可能突破科层制的理性化牢笼的方向。无论是行动者的利益角度还是从行动者遵循的社会文化角度,都蕴含了一个更为基本的理论任务:制度作为行动者之间合作的可能方式,如何基于这两个方向形成对制度的新理解,找到行动者之间合作的新的可能?

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承接了老制度主义的社会文化研究思路。通过定性、定量研究展现了国家、资本、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力量如何影响了组织制度。但是因其策略性地放弃了对组织行动者的关注,而疏于找到一种行动者基于社会文化因素形成组织行动者之间合作的制度理论可能。

虽然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研究更多是在与经济学理论传统内部讨论组织问题,仍可以作为从行动者利益的角度讨论人与人之间合作可能

的参照。但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市场中的组织企业的讨论,是否使用其他类型的组织制度让人怀疑。即使在严苛的条件下,行动者角色设定可以成立,并且构成了一种充分的对合作制度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如何形成一种现实的社会结果?这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是否需要一种行动者认可或认知的合法性?我们也很难从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研究中找到这些问题的回答。

从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中提出的理论任务和新制度主义的两个分支流派理论在该问题领域的相关讨论来看,构建一种表现有关行动者之间合作可能的制度理论的任务尚未完成。是否可以根据行动者所遵循的社会文化因素来发现他们之间的合作制度可能?对此,R·弗里南德和R·阿尔弗德所提出的“把社会因素重新纳入研究中来”思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他们在这篇反思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将制度本身看做是一种符号系统,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符号系统(资本主义制度、政府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和科学的制度)指导行动者的组织生活。<sup>[14]</sup>

弗里南德和阿尔弗德提出,“各种制度都是一个符号系统,有着不可观察、超理性的意指,也有着具体体现它们的可观察的社会关系”。一种制度或者符号系统都有一个核心的制度逻辑,如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逻辑是积累,政府制度的核心逻辑是对人类互动的调节和规制,家庭制度的逻辑是“共产主义”等。行动者则在不同的社会现实实践中遵循不同的制度逻辑,也依据这些逻辑构建具体情境中组织生活。所以,在这一基础上,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组织制度的变迁或制度化现象,视为这些制度之间发生矛盾的过程。

如果说迪马吉奥、鲍威尔等人将社会因素视为一种对组织制度和组织生活形塑的外在力量,弗里南德和阿尔弗德则更倾向于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诸种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因素构成的不同形态。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一种个人组织生活中“物质实践”所依据的“符号结构”。这种视角不再是社会文化因素与制度的两分模式,而是将制度本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因素。如此一来,实现了行动者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结。提供了一种在制度冲突中考察行动者之间合作的可能

方式的思路:考察不同的符号系统及其如何作用于行动者之间的合作方式——行动者遵循了哪些核心制度逻辑来实现合作,最后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

弗里南德和阿尔弗德“制度矛盾”思路为我从行动者思考组织制度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几个符号系统:资本主义的、政府的、民主制的及家庭的核心逻辑,是否足以构成我们理解中国的组织生活现实仍有待疑问。因此,弗里南德和阿尔弗德的文章带来的启发在更多意义上是参照性的或是疑问式的:在中国,个体之间组织合作的制度是根据行动者之间共享的哪些社会文化因素来实现的?哪些与国外制度分析中呈现的方面有共通之处,而有哪些实现经验源于本土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方面需要我们梳理既有的组织研究中提供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又需要我们从一些特殊的中国经验现实进一步发掘行动个体实现合作的制度形式以及背后的合作逻辑。这可能是留待以后的研究中完成的任务。

综上全文分析,老制度主义社会学的组织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两种研究方向:利益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如何从这两种视角发现行动者之间合作可能的问题,仍是组织研究的重要工作。行动者的利益一定是影响组织中行动者合作的重要形式。它是我们回答制度问题时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全部。在既存的利益关系框架下,行动者之间形成一种合作制度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分析这种影响,就需要在研究中发现行动者运用了哪些、如何运用了社会文化因素来形成一种合作的制度。

本文对制度主义研究的讨论工作,是为了在本来已经纷繁复杂的众多制度主义研究中找到一种理论关联的可能,并从中发现当前组织研究的任务所在。所以在讨论中,笔者只是选取了制度主义研究中的少数典型研究,特别是在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并未覆盖全部研究。因此本文对相关分支流派研究的总结未必能代表其全部特色。

#### 参考文献:

- [1]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03.

[2] 鲍威尔·迪马吉奥.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 姚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3] [德]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阎克文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4] DiMaggio, Paul and Walter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ume 42, No. 2, 1983.

[5] Blau, Peter. *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 a stud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two government agencie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6] Selznick, Philip. *TVA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M].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4.

[7] Gouldner, Alvin. *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4.

[8] Meyer, John W., Brian Rowa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 83, No. 2, 1977.

[9] [美] 保罗·迪马吉奥. 作为专业工程的组织场域

的建构: 20世纪20—40年代的美国博物馆[A]. 鲍威尔, 迪马吉奥.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C]. 姚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0] [美] 保罗·赫希. 从伏击到金色降落伞: 作为文化框架和制度整合实例的公司兼并[A]. 张永宏.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1] [美] M·马丁, W·斯科特. 组织合法性的多维模型: 制度环境变迁中的医院生存[A]. 张永宏.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2] [美] 索恩. 美国公司中首席财务官的兴起[A]. 张永宏.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3] 张维迎. 西方企业理论的演进与最新发展[J]. 经济研究, 1994 (11).

[14] [美] 弗利南德·阿尔弗雷德. 把社会因素重新纳入研究之中: 符号、实践与制度矛盾[A]. 鲍威尔·迪马吉奥.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C]. 姚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马毓】

## Social Agents i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Institutionalism Schools

### ——Review of the I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 Studies

A La-tan<sup>1</sup>, QU Bo<sup>2</sup>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olitic,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wa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oncerns of the old institutionalism school of sociology. The scholars from this school sought to break free from the "iron cage",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Weberian theory of rationalization, by analyzing the social-culturally shared social agents and the plural interests of agents within social groups. New institutionalism sociological research developed the social-culture factor analysis of old institutionalism, and illustrated how social-cultural factors were operated in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 a broader unit consisting of related organizations rather than a single organization. However, social agents no longer appeared in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economics built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organizational study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ests of individual agents. Yet, it transformed the analytical tradition of old institutionalism, with its basis in agents' interests within their social circumstances, into a theory based on pure market exchange interests. Building on these three schools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 focus on the institution as a system of social symbols is one possible way to bring social agents back to the center of organizational studies.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study; institutionalism; social agents